

Spring 2018



亚洲研究动态

Asia Research Network

March No.40

2018年3月 第四十期



亚洲研究动态 Asia Research Network

第40期
2018年3月

主编：郭棲庆 赵宗锋

编辑：王惠英

设计：大达期刊设计公司

E-mail: icwar@bfsu.edu.cn

电话：86-10-88813845

传真：86-10-88816556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19号

北京外国语大学西院综合教学楼1041室

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 100089

出版人

朴仁国 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事务总长

彭龙 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

编委会顾问

林建华 北京大学校长

邱勇 清华大学校长

蔡昉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刘伟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许宁生 复旦大学校长

龚克 南开大学校长

胡正荣 中国传媒大学校长

彭龙 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

潘一山 辽宁大学校长

朴永浩 延边大学校长

吴朝晖 浙江大学校长

Phung Xuan Nha 越南国立大学校长

Pirom Kamol-Ratanakul 泰国朱拉隆功大学校长

Khlot Thyda 柬埔寨皇家学院院长

Soukkongseng Saignaleuth 老挝国立大学校长

Regsuren Bat-Erdene 蒙古国立大学校长

Pho Kaung 缅甸仰光大学校长

编辑委员会

吴志攀 北京大学亚太研究院院长

李越 清华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田德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伊志宏 中国人民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金光耀 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杨龙 南开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丁俊杰 中国传媒大学亚洲传媒研究中心主任

陆杰荣 辽宁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朴灿奎 延边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罗卫东 浙江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Bouadam Sengkhamkhoutlavong 老挝国立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Kyaw Naing 缅甸仰光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Prapin Manomaivibool 泰国朱拉隆功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Bazartseren Boldgiv 蒙古国立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Sum Chhum Bun 柬埔寨皇家学院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Nguyen Thi Anh Thu 越南国立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张西平 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

郭棲庆 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副主任

赵宗锋 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执行副主任

CONTENTS

目录



P.02

→ 2018年3月23日至25日，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理事会理事长兼主任彭龙随同教育部部长陈宝生访问日本广岛，出席中日人文交流大学联盟第二次会议，与广岛大学签署校际交流协议，取得丰硕成果。



P.04

→ 2018年3月9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研究中心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承办的第八届亚洲研究论坛在北京召开。本届论坛的主题为“澜沧江—湄公河合作与区域纺织业价值链发展”。

特稿

- 02 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彭龙随同教育部部长陈宝生访问日本，出席中日人文交流大学联盟第二次会议
- 04 第八届亚洲研究论坛“澜沧江—湄公河合作与区域纺织业价值链发展”国际研讨会在京召开

学术活动

- 07 “‘一带一路’：全球化转型时代的中国方案”研讨会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举行
- 11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院长孙涛、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杨龙访问柬埔寨和缅甸
- 13 “亚洲文化”系列学术讲座第五讲至第八讲举行

研究进展

- 19 习近平元首外交与中斯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路径选择、影响因素与危机处理
- 29 韩国学生汉语心理词典构成及影响因素

学者与著作

- 36 《日本“中国文学研究会”研究》



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彭龙随同教育部部长陈宝生访问日本，出席中日人文交流大学联盟第二次会议

2018年3月23日至25日，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理事会理事长兼主任彭龙随同教育部部长陈宝生访问日本广岛，出席中日人文交流大学联盟第二次会议，与广岛大学签署校际交流协议，取得丰硕成果。

3月24日，中日人文交流大学联盟第二次会议在广岛大学千田校区举行。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出席会议并作主旨讲演，彭龙代表联盟发起单位致辞。来自中日双方22所大学的80余人参加了此次会议。

彭龙在致辞中向与会者介绍了北外办学77年来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和发展现状，他表示，北外是中国开设语种最多的大学，目前共有98个语种，到2020年将开设超过100个语种，实现与中国建交国家官方语言的全覆盖。2017年北外成为教育部“双一流”建设高校。学校积极开展国际合作，与包括日本在内的世界87个国家和地区的441所高校和学术机构签订了校际交流协议，积极推进与世界高校的交流与合作。



会上，在陈宝生部长的见证下，彭龙代表北外与广岛大学校长越智光夫签署了《北京外国语大学与广岛大学学术、教育交流协议》，双方将在研究生双学位项目、共同开展研究、教师间交流合作、学术刊物出版以及学术信息交流等方面进行全面合作。彭龙表示，希望两校的合作能够务实、高效、富有成果，为中日人文交流起到示范作用。

中日人文交流大学联盟是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中日人文交流研究中心理事长白刚的提议下，于2017年9月29日在西北大学成立的。联盟的成立旨在发挥我国各地区优势，整合国内中日人文交流研究领域的相关资源，不断研究探索中日人文交流机制和路径，同时联合日本高校，在中日之间开展多层次、宽领域的人文交流活动，为推动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访日期间，彭龙与广岛大学校长越智光夫、副校长佐藤利行进行了会谈，就建立两校研究

生双学位制度、扩大交流合作学科领域、探索3+3本硕连读合作模式等深入交换了意见，初步达成了尽快开启洽谈上述合作项目的共识。

广岛大学是一所拥有70年发展历史的日本一流国立综合大学，设有12个院系、12个研究科、23个科研机构，以及5个日本“21世纪国家重点科研项目(COE)”基地，教学和科研实力十分雄厚。近年来，广岛大学积极推进和实施“领先型国际化大学及培育型大学项目”“研究大学强化事业项目”“革新型创新课题项目”“新一代研究人员培养课程项目”等重大项目，同时还利用地区优势开设了“和平教育”等特色专业，在国际合作方面也有着较强的影响力。

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摘编



第八届亚洲研究论坛“澜沧江—湄公河合作与区域纺织业价值链发展”国际研讨会在京召开

2018年3月9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研究中心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承办的第八届亚洲研究论坛在北京召开。本届论坛的主题为“澜沧江—湄公河合作与区域纺织业价值链发展”。来自缅甸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所、柬埔寨发展与资源研究所、泰国朱拉隆功大学、越南社会科学院、老挝工业与贸易经济研究所等“澜湄”五国的知名学者，外交部澜湄合作中国秘书处官员，以及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云南大学、中国纺织信息中心、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等国内智库资深专家代表参加了本次论坛。

开幕式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姚枝仲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局长王镭、缅甸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所资深顾问、缅甸经济学学会副主席 Khin Maung NYO、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书记陈国平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王镭指出，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的提出恰逢其时，意义重大。中国当前正处于经济升级和发展的新阶段，十九大报告提出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中国加强与澜湄地区合作，加强与东盟国家合作，是中国进一步深化开放、共建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分享中国经济发展成果和经验的重要举措。中国社会科学院致力于与其他澜沧

江—湄公河沿线国家共同推动澜湄地区智库合作网络的建设,将研究问题聚焦于地区发展的重点、长期、战略性问题,为政府和国家提供智慧支持、政策建议,造福于六国的人民。世界政治经济研究所在这一领域正在发挥带头作用。未来澜湄合作机制,包括澜湄合作智库网络,都将拥有广阔的前景和巨大发展。

Khin Maung NYO 先生在致辞中对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邀请表示了感谢。他说,中国是缅甸的好朋友,缅甸支持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并且积极参加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湄公河流域国家之间的相互联系,建立湄公河流域国家之间的国家合作,相互信任,才能够共同的应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挑战。同时,澜湄合作是加强与东盟联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澜湄合作有助于推动东盟的一体化进程,推动东盟的发展和建设,才能将澜湄国家打造成为全球可持续的发展核心,我对澜湄合作的未来发展充满信心。

陈国平代表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在开幕式致辞,他表达了对各位与会嘉宾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他指出澜湄合作是“一带一路”框架下重要的次区域合作机制和合作平台,纺织服装业是关乎民生福祉的重要产业。本次论坛主题的设定非常符合澜湄合作的特点:扎实、具体、接地气。社科院世经政所与多个澜湄国家的研究机构保持了非常紧密的学术联系和交流,有很好的合作基础,希望未来能够通过进一步智库合作和学者的推动,为澜湄合作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会议共设四个议题,分别为:“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影响及展望”“澜沧江—湄公河区域产能合作:机遇与挑战”“澜沧江—湄公河区域纺织业合作:国别介绍和价值链发展的路径分析”“澜沧江—湄公河纺织产业发展:合作研究”。

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教授、东南亚研究

所所长卢光盛以“澜湄合作从培育期走向成长期”为题作了主题发言。他指出澜湄合作框架已经巩固,合作的领域由原来的3+5扩展到了3+5+X的合作,更加全面,澜湄五年行动计划是未来澜湄合作的重要蓝图。澜湄合作面临的主要困难在于:第一,政治和安全领域合作和互信有待加强;第二,整体区域合作水平还比较落后;第三,合作的领域存在敏感问题,比如水资源;第四,澜湄合作机制与现有的其他区域合作机制关系还需要理顺。此外,他指出澜湄合作还需要特别关注下游国家真实的利益诉求和实际感受。

泰国朱拉隆功大学中泰研究中心研究员Kulnaree NUKITRANGSAN 博士指出,泰国积极参与澜湄合作,在推动澜湄次区域现代化建设、经济可持续发展、生态环境建设、水资源合作,以及互联互通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和积极的作用。从产能合作领域来看,中泰之间存在广阔的合作空间。泰国正在进行生产部门的进一步升级,从非正式的生产行业进一步转向正式的生产行业,化工以及纺织业、汽车制造、设备制造等都是合作的重点领域。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区域合作研究室主任王主玉从合作背景、机制化建设、预期目标等方面,将澜湄合作机制与日本和美国为主导的次区域合作机制进行了比较研究,他认为从中方角度看,澜湄合作不仅仅是局限于经济发展与合作,更应当从中国最高国家利益出发。中国的发展需要稳定繁荣的周边环境,共同建设澜湄大家庭,构建澜湄命运共同体,分享中国成功经验,使澜湄地区成为中国更加紧密的贸易和投资伙伴,有助于服务这一大的战略目标。

越南社会科学世界政治研究所副所长Nguyen Binh Giang 的发言从越南国内经济政策的角度,分析了当前越南纺织服装业发展



面临的困难。他指出，越南在促进跨国公司与国内企业的联系、改善投资环境、加强研发投入，以及政策间的协调等方面，都存在着明显不足。当前，越南的纺织服装行业尚不存在完整的价值链，越南加入的自贸协定，如CPTPP，拥有非常高的原产地规则和标准，不能仅仅是来料加工，完成产业链一个环节。越南需要大力促进配件、原材料等上游部门的发展，通过吸引外资，提高生产和竞争能力。越南希望加强与中国和泰国的合作，收获发展经验，促进辅助部门发展，建立产业群，从而促进越南加入全球纺织服装产业链。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区域经济合作研究中心主任张建平在发言中指出，纺织业是澜湄产能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围绕澜湄区域纺织业价值链发展进行研讨，对培育澜湄合作内生动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国是纺织业大国，具有完整的产业链条、管理技术和丰富经验，纺织业也是湄公河国家的重要产业之一，湄公河国家在人力、资源成本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双方具有高度的互补性，合作潜力巨大。澜湄地区很有可能成为下一个世界工厂和世界新的制造业中心。

老挝工业与贸易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Vieng-savang Thippavong 先生、缅甸 DaNa Facility 战略和纺织服装部主任 Myo Myo Myint 女士和中国纺织信息中心副总经济师、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社会责任办公室首席研究员梁晓晖博士分别从老挝、缅甸、中国的角度，介绍了本国纺织服装行业的总体发展、行业布局、对外贸易和投资联系等具体情况，并对澜湄地区构建区域性纺织业价值链提出了积极的建议。

本次会议旨在配合于3月19日至25日进行的“澜湄周”活动。会议从纺织业价值链与澜湄沿线六国经济发展的视角，为澜湄合作提供理论研究和产业合作和政策建议，为深化中国与东盟合作、缩小东盟内部发展差距提供新动能。与会嘉宾在会议期间互动交流，共同分享澜湄六国经济发展与合作的经验，总结两年来“澜湄合作机制”建设的巨大进展，分析相关挑战，并就如何应对挑战提出各自的洞见与建议。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一带一路’：全球化转型时代的中国方案”研讨会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举行

2018年1月14日，由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和北京大学出版社等单位联合举办的“‘一带一路’：全球化转型时代的中国方案”研讨会暨第120期北大博雅讲坛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东旭报告厅举行。此次研讨会同时也是“回眸改革开放40周年，献礼北京大学120周年”系列庆祝活动之一。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张辉教授和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副主任刘建兴分别主持了上午和下午的研讨会。

建设“一带一路”是由中国发起并惠及世界的一项重大倡议。自2013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首次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我国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转化为“一带一路”建设的实际行动，积累了丰硕的成果，得到了全球一百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热情参与。从“一带一路”被写入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到2017年高峰论坛召开，从党的十九大报告五次提及，到“一带一路”建设被写入党章，无不证明“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性和影响力。这是中国总结改革开放经验、分享中国智慧，为当前世界经济转型提供的中国方案。研讨会贯彻和落实党的十九大会议精神，围绕“一带一路”倡议，总结和提炼了倡议提出四年来的主要成就、面临的主要问题以及新时代全球化转型的机遇与挑战等重要主题。

上午9时，会议正式开幕。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孙祁祥教授致欢迎辞。孙祁祥代表经济学院向出席研讨会的嘉宾和来宾表示热烈的欢迎。她指出，在北大建校120周年之际，在经济学院举办这样一个重要活动，邀请到知名的学者、专家，特别是“一带一路”方面的专家来到现场，共同探讨全球化转型时代的中国方案，具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和重要的现实意义，体现了北大经济学人为中国经济进一步的改革开放贡献智慧的意愿。

北京大学副校长王博致辞。他表示，北大对中国具有的特殊意义，一要继承遵循学术和教育规律的传统；二应从服务国家、服务社会、服务人类，从重大问题和重大趋势出发开展研究；三是要坚持北大自身的追求。他认为，这是一个合作的时代，必须充分整合多学科力量，让我们的观察、认识和理解更有整体性，为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响应国家号召作出北大人的贡献。

北京大学出版社社长王明舟致辞并宣布“一带一路”协同发展研究丛书系列的第三部《“一带一路”：区域与国别经济比较研究》正式发布。在北京大学和国家开发银行强强联合推出的系列研究基础上，该系列丛书自出版以来就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在出版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以及国家级项目的高度肯定，先后入选“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2017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迎接“十九大”重点出版物、国家出

版基金资助项目等,并输出了英文版权。他表示,北京大学出版社期待在各位学者的支持下,推出最新的研究成果,为经济建设提供理论范式和科学指引。

主旨演讲环节,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教授首先发表演讲。他以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切入点,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种发展理念,“一带一路”是落实这一理念的具体方略与途径。方略和理念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从理论基础看,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有两个理论依据,即马克思主义和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从实践探索上看,应明确一个指导思想,即当代世界按照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哲学理念,不是简单的对峙,而是在对峙中寻求最大公约数,发现矛盾的统一性。刘伟强调,这是在处理今后国际经济关系、贸易关系等各方面问题时必须牢固树立的基本指导思想。中国给出了富有中国智慧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一带一路”方略,它对人类进步有极其巨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原国家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分析了“入世”谈判以来的国际区域大环境和我国对外开放战略的新特征。他指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的15年间,综合实力迅速提高,产生了深刻的历史影响。“一带一路”是习近平主席在十八大以后提出的一个重要的国际合作倡议,是中国对外开放又一重大举措,体现了中国智慧和成为经济大国后的担当精神。从观念层面看,中国“入世”的最大成果在于引进了双赢的理

念。从实践层面看,2001年成功“入世”以后,中国不仅自身综合国力得到极大提升,同时也给其他国家带来了巨大利益。而“一带一路”统筹国内和国外两个大局,一方面推动中国对外开放,另一方面推动国际合作。同时还为解决我国国内东部和中西部发展不平衡问题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龙永图认为,实施“一带一路”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很多困难,讲好、讲清“一带一路”故事不仅有利于世界,同时也有利于中国,应当动员全球参与“一带一路”合作,实现“不是中国的独奏,而是世界的合奏”。

国家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院院长刘勇从国家开发银行的实践角度,探讨了“一带一路”与全面推进改革开放的关系。“一带一路”将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有力抓手,将推动建立全球化问题的国际新规则。在具体实施方面,应多点切入、多区域布局,以点带线、线点结合、以点为主,通过建立合作区、特区等促进点的发展,进而促进线的结合。刘勇还强调,既要遵守国际贸易规则,同时也要坚持创新治理体制,把“一带一路”和未来世界发展规划相结合。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刘卫东研究员论述了“一带一路”倡议的理论思路,提出了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到包容性全球化的思路。他回顾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几个重要阶段及其决定因素,分析了当前瞬息万变的世界经济形势,以及中国在全球经济中角色和地位的变化,指出为什么“一带一路”能够在经济全球化的道路上发挥重要作用。刘卫东认为,“一

带一路”从中国的倡议变成一个全球的共识，形成了一种新的政治理念，这种政治理念就是引领包容性全球化。他强调“一带一路”是用丝路精神推动相关经济体的合作，包容性的全球化也是丝路精神的重要体现。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国地所所长史育龙从创新对外投资合作方式的角度提出了扎实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方略。针对这一方略，史育龙从多个方面进行了具体论述，比较重要的是，随着当前形势的变化，“一带一路”从开始设计的“六廊六路、多国多港”框架，经过五年的发展已经出现了新的特点。面对这些新形势，他提出在整体国际环境上营造一个更加宽松适宜的环境，用平常心看待建设过程中出现的分歧和风险，基于国际环境的变化认真研究“一带一路”建设的长效机制，在各项目上采取灵活推进方式等应对思路。他还提出了四条具体建议，涉及项目设计、制定差异化政策包、创新合作方式降低资金成本以及国内企业和机构能力的建设等。

张辉总结上午嘉宾发言，认为在当今的世界环境中，我们要深入学习和贯彻“一带一路”倡议，宣扬丝路精神，这是新时代下全新的中国方案。“一带一路”建设蓝图定位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框架之下，走向了快速、包容、高质、深入的发展道路，作为这个伟大时代的见证者，我们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未来无比期待。《孟子·梁惠王下》中有这样一段千古流芳之问：“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中国将在“一带一路”倡议推进过程中不断将向世界

证明，中国经济的发展不是“独善其身”的发展，更有古道热肠之诚恳、一言九鼎之诚信、身先士卒之承诺、兼善天下之承担。《兰亭序》有言，“后之视今，亦如今之视昔”，希望后来人在回顾往事的时候，也能够为我们这个时代感到自豪。

下午的研讨会邀请了“‘一带一路’协同发展研究丛书”的主要作者和特邀嘉宾，紧密围绕“一带一路”建设中的热点问题，从各自的专业领域进行了交流探讨。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宁琦教授从区域国别文化研究的角度探讨了“一带一路”建设推进过程中的问题。她就沿线区域国家的语言、文化、历史、宗教、政治等领域分析了“一带一路”建设呈现出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她认为，我们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系统工程中，需要更多的积累，并加快储备前瞻性的研究，其中战略语言资源的建设极其重要。

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院长洪俊杰教授回顾了人类经历的三次全球化浪潮，对中国在百年未有的大变局背景下，建设开创性经济发展新阶段涉及到的各方面问题进行了分析。他还简要介绍了当前全球价值链发展中的共轭环流理论，强调提升“一带一路”价值链环流的引领能力、打造中国主导的全球价值链、推广友好型国际规则的重要性。他认为“一带一路”应当成为以共同发展、合作共赢为主要特点和理念的全球治理体系。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王大树教授带来了题为“‘一带一路’：为人民币国际化带路”的演讲。

他指出，在贸易发展迅速的今天，应该让多种货币行使世界货币的职能，有效对冲货币体系和全球化的风险。从货币国际化理论角度而言，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行十分重要。王大树借鉴“涟漪理论”，论述了以中国内地，特别是以上海为圆心，逐步扩大推行人民币的国际货币职能的路径。他认为“一带一路”的互联互通建设将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开辟一条新的路径。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信息中心与创新中心主任徐辉分析了胡焕庸线和“一带一路”的关系，指出经济、历史位置、地理、区域、城市发展等方面的纵横捭阖，构建了“一带一路”战略空间的格局架构。他认为，我国有很多核心城市和独特的具有特殊职能的城市，正是由于中国城市的不断发展，我们才能承担“一带一路”倡议、战略、措施这样的艰巨任务。建设好内陆城市三大板块可以为“一带一路”推进做好纵深部署。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主任晁涛副教授从“道”和“术”的层面解释了全球化、全球化秩序以及中国区域研究的世界历史位置。中国的区域研究思考的是在当前“一带一路”背景下，在方法、概念、理论上有可能进行的创新和补充学习。“一带一路”作为中国版本的全球化是对原有的世界秩序的补充，是一个改革倡议，而非一个颠覆性思路。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王旭副教授分析了当前在南亚地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机遇与挑战。他认为，“一带一路”在南亚的推进，涉及到多文化、多政治立场、多重博弈的问题，

还涉及中美、中日、美印等双边关系。处理南亚地区各国的关系，尤其是中印关系，对世界经济全球化具有关键作用。我们应具备一定的战略定力和战略耐心，用平常心去面对正常的挑战与机遇。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蓝庆新教授就“‘一带一路’：中国经验推广”这一主题发表演讲。他认为，我们的目标是让世界人民、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了解我们的理念和我们的发展经验。他总结了“中国经验”并将其归纳分为发展模式、发展制度、发展理念、发展方案四个方面，并依次进行了阐述。

交通部规划研究院高级工程师秦建国分享了他关于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研究以及“一带一路”建设与交通运输组织的关系。他重点分析了中欧班列在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中的问题与挑战，对中欧班列在“一带一路”进程中的发展持积极态度。他提出，多式联运发展是降低物流成本的一个重要选项，在这个重要选项里中国要发挥自己的创造力，进一步增强自己的实力。

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处处长吴志峰主持了问答环节，与会嘉宾围绕“一带一路”中的金融开放行为、海外项目投资风险把控、向西开放中的民族文化冲突以及城市化建设战略等问题与现场听众进行了互动交流。

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摘编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院长孙涛、 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杨龙访问柬埔寨和缅甸

2018年3月22日至28日，应柬埔寨皇家翰林院亚洲研究中心、缅甸仰光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缅甸曼德勒大学的邀请，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院长孙涛、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杨龙访问柬埔寨和缅甸。

3月23日，孙涛院长一行在暹粒拜会了柬埔寨皇家翰林院副院长、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Sun Chhum Bun 教授，双方就合作事宜进行了探讨

与交流，孙涛院长欢迎 Sun Chhum Bun 副院长访问南开大学。3月24日，孙涛一行在金边会见了柬埔寨皇家翰林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 Kin Phea 教授，双方就研究生培养、留学生教育、短期访问学者等方面的合作进行了探讨。

3月26日至28日，杨龙主任分别访问缅甸仰光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缅甸曼德勒大学。缅甸仰光大学校长 Pho Kaung、缅甸曼德



勒大学校长 Thida Win 分别会见了杨龙，杨龙向两校校长转达了南开大学副校长朱光磊的问候，表达了南开大学从校际层面到亚洲研究中心层面与对方的合作意愿，介绍了南开大学学生交流项目、留学生项目、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英文硕士生项目、亚洲研究中心的国际交流项目与天津论坛的情况，提出了亚洲研究中心之间合作的三种建议方式。Pho Kaung 校长特别表示了对南开大学与英国格拉斯哥大学本科生“3+1”项目的兴趣，希望能够以某种方式加入该项目。仰光大学副校长兼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Aung Kyaw 教授介绍了仰光大学及其亚洲研究中心的发展情况。缅甸曼德勒大学副校长 Tin Tun Aung 表示希望与南开大学建立校际合作关系，提出希望参与共同举办天津论坛的意愿。杨龙与对方探讨了曼德勒大学参与天津论坛的合作方式，包括作为组织单位之一，或承担一

个分论坛，并提议曼德勒大学校长方便之时访问南开大学，双方领导进一步商议建立合作关系事宜。双方还就缅甸学生留学南开大学，交换生交流，曼德勒大学参与南开大学暑期课程班等项目进行了讨论。

缅甸仰光大学副校长 Omar Kyaw 教授、国际关系系主任 Chaw Chaw Sein 教授、人类学系主任 Thindar Htwe Win，曼德勒大学副校长 Myin Zu Minn 教授、地理系主任、化工系主任，以及来自国际关系系、法学系、缅甸语言系的教授参加了会谈。

南开大学亚洲研究中心

“亚洲文化”系列学术讲座 第五讲至第八讲举行

2017年6月至12月，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和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共同主办了以“亚洲文化”为主题的系列学术讲座，邀请美国犹他大学（The University of Utah）语言文学系终身教授吴伏生、北京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副院长姚斌教授、北京语言大学周阅教授、杭州师范大学艺术教育研究院李庆本教授作了四场学术演讲。

第五讲：选择切入点—— 奥尔巴赫与钱钟书的启示

2017年6月15日下午，美国犹他大学（The University of Utah）语言文学系终身教授吴伏生作了题为“选择切入点——奥尔巴赫与钱钟书的启示”的学术报告。讲座由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副院长顾钧教授主持。

吴伏生教授首先强调了切入点的选择在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重要意义。他说，一个明确可行的切入点不仅可为论者指明研究的内容和方向，而且还会为他提供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与策略。他认为，两位比较文学大师——德国的埃里希·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 1892—1957）与中国的钱钟书（1910—1998）均主张以具体可感、具有启发放射功能的文本细节作为出发点，进而深入全面探讨某种文学现象。他以奥尔巴赫《摹仿论——西方文学中所描绘的现实》（*Mimesis: The Representation of Real-*

ity in Western Literature）和钱钟书《管锥编》作为研究实例，具体阐述了两人的研究特点及相同之处，认为奥尔巴赫与钱钟书的比较文学研究都是对理论范畴的探讨，这两位学者所选择的出发点与切入点均不是抽象的理论概念和框架，而是那些具体的文本现象，却都成为比较文学领域的经典著作。

吴教授从奥尔巴赫和钱钟书的著作出发，谈到了文学研究过程中理论框架与文本分析的关系。他认为，文学研究是对文学的研究，总是文本在先，理论随后，因为后者乃是对前者的分析归纳，文学理论对文学创作具有指导作用，理论概念和框架在比较文学中倘若运用得当，会帮助我们分析某种综合现象，但是这些理论概念和框架必须是论者本人对某种文本现象研究梳理之后所形成的认同，那些只关注理论著作而不对文本进行探究，甚至用选择性的文本填入理论框架的做法是本末倒置、很容易倒塌的。

吴教授最后讲到，奥尔巴赫和钱钟书的实践表明，成功的文学研究必然带着鲜明的个性特征，因为这一成果是研究者长期游心艺林、咀嚼英华、深思熟虑的切身体会，浸透着个人的生命、直觉、知识和智慧。正因为此，奥尔巴赫和钱钟书的比较文学研究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在那些求新猎奇的“时髦”课题成为历史陈迹之后，仍然与那些不朽的文学艺术作

品一起打动着我们，给我们以灵感和启迪。

讲座后，同学们踊跃提问，吴伏生教授进行了耐心细致的解答。

吴伏生教授，美国布朗大学（Brown University）比较文学博士，现任美国犹他大学（The University of Utah）语言文学系终身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比较文学、中国文学和翻译学。出版有英文专著 *The Poetics of Decadence: Chinese Poetry of Southern Dynasties and Late Tang Periods* (1998); *Written at Imperial Command: Panegyric Poetry in Early Medieval China* (2008); 中文专著《汉诗英译研究：理雅各、翟里斯、韦利、庞德》(2012)、《英语世界的陶渊明研究》(2013) 等。

第六讲：东西方早期文化交流中的译人角色——以鲁布鲁克东行为例

2017年11月20日下午，北京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副院长姚斌副教授作了题为“东西方早期文化交流中的译人角色——以鲁布鲁克东行为例”的学术报告。来自北外各院系的师生济济一堂，聆听了本次讲座。讲座由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副院长顾钧教授主持。

讲座伊始，姚教授简要介绍了鲁布鲁克东行的时代背景。在13世纪，由于蒙古人西征打通了欧亚之间的交通要道，从而为东西方文化彼此间的交流传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了更好地加深对于彼此文化的了解，译人在协调东西双方的文化往来中便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作为沟通鲁布鲁克与蒙方之间交流的桥梁，一众

译人们在与鲁布鲁克的相处中，引发了姚教授的许多思考。

对于鲁布鲁克1253—1255年东行访蒙的这段经历，到目前为止，已经有不少学者对其有过描述和考证，此外，也有一些研究者曾简略地提及鲁布鲁克出使活动中涉及到的语言沟通问题。但可惜的是，关于他在东行时遇到的译人翻译质量的问题，国内目前少有学者进行过专业研究，而这一学术上现存的空白则激发了姚教授进行深度研究的极大兴趣。他希望可以借助这一翻译研究，从而为人类文明交流史提供全新的观察视角。

随后，姚教授就鲁布鲁克东行时遇到的译人们展开了具体阐述。从与他有过直接合作的哈莫·德依、金匠威廉之子，再到为蒙方朝廷服务的口译译人，以及对来往信函进行专业笔译的译人，姚教授生动地讲述了六个《鲁布鲁克东行记》中记叙的有关译人的小故事，让大家对这些过往的译人有了初步的认识。在姚教授声情并茂的讲述中，哈莫·德依对待翻译活动的不严谨、不细致与金匠威廉之子认真、高质量的翻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这也开启了姚教授接下来对于鲁布鲁克看待译人们态度的论述。

他提到，除金匠威廉之子外，鲁布鲁克对于行程中为自己翻译的译人基本都保持着不太认可的态度。在鲁氏的眼中，金匠威廉之子所具备的丰厚学识和充足的口译实战经验，让他得以在元朝的一众译人中脱颖而出，成为优秀的文化协调者。

其后，姚教授还简单地提及了译人们在历史上充当的多元角色。虽然在鲁布鲁克所处的时代，译人并未像现在一般，成为正式的专门职业，他们往往还会承担起财务管理、保镖，甚至是匠人的任务，可谓是“身兼多职”。

最后，姚教授用“译人的黄金时代”一词简要概括了本次讲座的要旨。在他看来，正是因为译人的出现，从而为13世纪东西方的文化交流提供了极大的便捷。虽然在当时由于缺乏系统的正规训练，译人们的素质和质量无法和现代相提并论，但他们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却发挥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正是因为有了他们，世界文化的互通互鉴才转变为现实的可能。对于有关“译人”这一方面的研究，姚教授希望在未来可以有更多的学子投身于此，从而为丰富文化交流以及翻译方面的研究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在随后的交流互动环节，同学们就口笔译研究、元代中西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内容与姚教授进行了热烈的探讨。

第七讲：近代中日文学与西方文化——以川端康成、田山花袋为例

2017年12月4日下午，北京语言大学周阅教授作了题为“近代中日文学与西方文化——以川端康成、田山花袋为例”的学术报告。讲座由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副院长顾钧教授主持。

周教授首先以著名作家川端康成为例开始了她的讲座。川端康成身着日本传统和服接受诺贝尔奖，在获奖演讲《我在美丽的日本》中

引用了和歌，这无疑表达出川端对民族根基的坚守，但接下来周教授提出川端康成的作品并无绝对纯粹之民族文化。实际上，川端的作品中充满了东西方文化的结合。周教授以川端作品创作时间为序，详细分析了《蓝的海黑的海》《抒情歌》《雪国》《山音》《睡美人》等作品中的“蝴蝶”意象，指出它们都渗透着道家的“庄周梦蝶”的影响。周教授认为，川端早在东京大学读本科时就对庄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看法，由此可以证明中国文化对日本之影响不仅在古代，也在现当代。

周教授回顾了日本明治维新后全面向西方学习的历史，谈及两个“老师”——德国和美国——对日本的中西文化观的巨大影响。她以福泽谕吉提出的“脱亚入欧”论，以及东京大学学科建制全盘欧美化为例，具体论述了西方对日本的影响。在此背景下周教授详细分析了二战后川端的小小说《重逢》，其表现出的战后日本对美国文化的接受以及日本传统文化受到的冲击和人民精神层面的荒芜，非常耐人寻味。

周教授着重指出，尽管近代日本和中国都全面向西方学习，但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文学史书写，以及在词汇层面，中日之间的交流并未中断。特别是在日本明治维新成功而中国的百日维新失败后，中国开始向日本学习。周教授以郁达夫为例，详细分析了他如何受田山花袋的《棉被》的影响而创作了《银灰色的死》《沉沦》等小说。

最后，在与老师同学们的热烈讨论中，周教授强调了文化交互影响的历史复杂性，建议

同学们要以开放的眼光，看待双边与多边文化和文学在交互碰撞中的相互影响。

第八讲：中国文化的跨文化阐释与传播

2017年12月18日下午，杭州师范大学艺术教育研究院李庆本教授作了题为“中国文化的跨文化阐释与传播”的学术报告，讲座由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副院长顾钧教授主持。

李教授在讲座伊始就明确地指出：“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绝对不是文化侵略，而是为了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讨论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不可以采用影响研究模式，而必须采用跨文化研究的模式。”影响研究是一种二维模式的研究方法，研究A与B（本国和异国文化）的关系，而跨文化研究是一种三维模式的研究方法，要追寻影响的影响。李教授以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为例，当前很多学者用影响研究的方法对其进行研究，仅注意到叔本华对王国维的影响，却没有注意到东方思想对叔本华的影响，因此得出王国维以西释中的结论。事实上，叔本华的理论除了受到了柏拉图“理念”哲学、康德的德国古典哲学的影响之外，还明显受到东方佛教思想的影响。当我们不仅注意到影响，更进一步注意到“影响的影响”的时候，我们就有可能形成跨文化研究的三维模式，从而取代影响研究的二维模式，也就能够取代中西二元论模式。

李教授认为笼统地谈论“汉学主义”中的“以西释中”是没有意义的，而必须首先对“中”与“西”这两个概念进行界定。实际上，当我

们谈论“以西释中”的时候，当我们说外国的汉学家是不能理解中国的时候，隐含着—个理论预设，就是把中国和西方看成是截然不同的文化实体，而中国和西方这两个概念又被看成是固定不变的，这就形成了中西二元论。

对此，李教授通过援引各类出土文物和史书典籍，明确地指出“中国”、“中华”概念在历史上绝对不是一成不变的。李教授指出，“中国”一词最早出现于西周时期的青铜器“何尊”上的铭文中，“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义民”，当时“中国”的含义是“都城、京师之地”，这显然跟我们今天的“中国”概念大相径庭。“中华”一词则起源于魏晋时期，《晋书·桓温传》中称：“中华荡覆，狼狽失据，权幸扬越，螻屈以待龙伸之会，潜蟠之俟风云之期，盖屯圯所钟，非理胜而然也。”在当时，“中”即中原，“华”即“衣冠华族”，“中华”作为一个地域名称，是相对于边陲“四夷”而言的，主指汉族居住区。这与今天的中华概念也大不一样。

我们今天显然不可以按照古代的“中国”概念去阐释中国，不可以按照古时候的“中华”的定义去讲述中国故事，而必须按照今天的中国概念去讲述。我们也不能按照历史上的中国概念去重写中国文学史。因为那样，许多少数民族的文学显然就会被排斥在外。

为了说明不同文化之间既有差异性又有相通性，李教授又向大家讲述了“文化”的概念和对文化的多方面、多层次的认识。对于现代汉语词典中的文化定义，把文化定义为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

神财富的总和，李教授认为这样的定义过于宽泛，让人无法把握。他建议在前面增加限定词语，把文化定义为“为了满足人类自身需要”而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他解释说，人类所创造的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其外在形态尽管纷繁多样，但对应的内在的人类需要却是可以分析和把握的。李教授强调指出，满足需要的不同方式和手段，构成了不同民族文化的差异性；而人类需要的共同性，则构成了不同民族文化的相通性。这就是为什么不同民族文化之间可以互相交流、相互理解的根本原因。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求知需要、审美需要），李教授把人类的自身需要分为三个层次：物质层面、社会层面和精神层面，由此形成了文化的整体结构。在“文化圆形结构”中，物质文化位于圆形的外层结构，社会文化位于中层结构，精神文化位于内层结构，位于圆心部位的则是文化的核心价值。对于一个民族文化而言，文化发生变化的程度是由外而内逐渐减弱的。不同民族文化的物质文化是最容易互相影响的，在文化传播历史中，物质文化也是最容易传播出去的。相对来说，社会文化则相对稳定，而最稳定、最不容易传播的则是精神层面的文化，这也构成了一个民族文化的稳定性。我们说中华文化蔓延五千年没有消亡，没有中断，主要指的是精神文化，特别是中华身份认同，这才是一成不变的。

李教授特别指出，自“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的文化虽然发生了很大的变

化，但并未发生断裂。不能因为中国现代文化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就得出结论说中国文化在“五四”和“新文化运动”以后就断裂了。他援引王国维《殷商制度论》提出的“中国政治与文化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指出，中国的政治和文化发生巨变的时代是商周之际，这种变化在王国维看来可能要超过1915年以来的新文化运动。难道我们能因为殷周之际的政治文化发生了巨变，就认为殷商文化就不是中华文化了吗？

李教授向大家分享了文化传播的相关知识。他讲述到，汉语中的“传播”一词，对应英语“communication”，可以翻译为“交流、交际、传播”等。文化传播不同于客观知识的传播，涉及价值问题。不同文化之间的传播被称为跨文化传播，跨文化传播不同于同文化内的传播，涉及中外文化的差异性问题和文化误读问题。在文化传播的先后顺序和整体效应方面，李教授指出，在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史上，最先传播和输出的往往是中国的物产和技术发明，例如养蚕缫丝、纺织技术、瓷器、制瓷技术、中国的“四大发明”等等，一旦输出至国外，便很快在广阔的范围得到传播、应用和推广。因此，物质文化和技术文化的传播，在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中起到了先锋作用。相比之下，艺术文化、制度文化的传播和接受要缓慢些，传播的力度也相对弱一些；而作为文化核心内容的价值观和意义体系，其传播和影响受到的限制就更多一些了。但是，从另一个方面讲，文化不同的组成部分不可能被完全割裂开。物质文化

和技术文化的传播，必然会影响人们的精神生活，因为这些物产和技术的发明，体现了创造者、发明者的精神理念、审美趣味和价值追求。因此，物质文化的传播必然会带动精神文化的传播。反过来讲，精神文化的传播也必然会促进物质文化的传播。传播是文化的本性，文化只有在传播和交流中才能生存。一种文化如果要保存其勃勃生命力，除了传播、交流，别无其他法门。我们之所以要对外传播中华文化，就是由文化的传播本性所决定的。

在讲座最后一部分，李教授讲述了如何用跨文化阐释的方式方法对中华典籍进行阐释。

李教授认为，跨文化阐释类似“倩女离魂”，即暂时放弃自己的文化立场，设身处地的考虑对方的文化处境、理论场域，利用对方的“前理解”，用对方的语言或用对方听得懂的语言来阐述、解释自己的思想意图，从而达到沟通理解的目的。李教授举例说明，严复在向西方人讲授《周易》《春秋》时，在按照司马迁的解释——《周易》的写作方法是“本隐之显”，《春秋》的方法是“推见至隐”的基础上，进一步地说明，所谓“本隐之显”，就是“外籀”（即演绎法），“推见至隐”，就是“内籀”（即归纳法），这样外国学习者会更容易懂。蔡元培在向外国留学生讲中国的仁、义、恕这样的文化核心价值时，以自由释义、以平等释恕、以博爱释仁，这种解释不见得非常确切，当然也不是唯一正确的答案，但这种方法无疑会易于外国留学生的接受。中国的这些元典之所以称之为元典，就在于它意义的深厚性。所以我们有两千多年

的元典解释史，而不同时代的不同人都可以从自己的角度进行理解和阐释。元典的生命就存在于“日日新”的理解和阐释当中。如果我们试图预设一个固定不变且唯一的答案来框住元典，就等于扼杀了她的生命力。德里达曾言：“拒绝翻译就是拒绝生命。”同样，拒绝解释也是拒绝生命。在对本国的文化经典进行域外传播时，要遵循“和而不同”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准则，尤其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当今已经被奉为处理国家关系和人际往来的“黄金规则”。在跨文化传播中，对知识性的理解是固定的，而对于观念性的问题则要允许有不同的解释，跨文化传播最为重要的是寻找共性并在同时尊重差异。

最后，李教授就中华文化域外传播战略、中国古籍阐释、中华文化的特殊性与普世性的关系等方面的问题与现场聆听者进行了互动答疑。李教授的演讲报告生动形象、图文并茂，是一场涉及中国古代文学、比较文学、历史学、哲学、传播学的跨学科学术文化盛宴。

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摘编



习近平元首外交与中斯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路径选择、影响因素与危机处理¹

张颖 /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魏斌 / 国际关系学院

摘要

中国与斯里兰卡有着深厚的传统友谊，两国关系的发展现状和走向对中国在印度洋区域内相关利益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斯里兰卡作为“一带一路”建设在印度洋的支点国家，战略位置愈加重要。在中国与斯里兰卡的交往中，习近平通过元首外交，规划了中斯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路径目标，克服了影响中斯关系的不利因素，体现了习近平“亲诚惠容”的外交理念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思想；体现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中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遵循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扩大同各国的利益交汇点的战略思想；体现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的宏大构想。

关键词

元首外交 中斯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一带一路” 合作共赢 习近平外交思想

1 本文为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科研资助项目“首脑外交与中斯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构建研究”的研究成果。

一、路径选择

自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中国正“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¹ 伙伴关系建设是中国基于世界形势的判断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传统而确立的与结盟迥异的对外关系模式。自1993年在中国对外关系中出现第一个伙伴关系开始,中国至今已同世界上69个国家、5个地区建立了74对不同的伙伴关系。近年来,习近平提出,对发展中国家,中国要以真实亲诚理念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对周边国家,中国要以亲诚惠容理念深化同周边国家关系。斯里兰卡既是发展中国家,也是中国周边外交的战略延伸国家,中斯关系在中国全球伙伴关系网中占有重要一环。

中斯两国的友好关系源远流长、久经考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面临着西方国家的封锁和禁运,物资匮乏,经济发展出现困难。盛产橡胶的斯里兰卡在两国尚未建交的情况下,“把中国看作很亲近的邻居”,² 于1952年与中国签署《米胶协定》,率先与中国进行贸易往来。³ 1957年2月

自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中国正“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

7日,两国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此后几十年来,中斯高层来往密切,周恩来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徐向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邓颖超等多位中国国家领导人到访斯里兰卡,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也多次访华。双方在国际重大事务和地区问题中的互信不断增强,两国的经贸和人文交流频繁,双方的合作堪称典范。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经济往来成为中斯交往的核心内容之一,双方经贸往来规模不断扩大。2007年中国对斯里兰卡的建设援助总额达到10亿美元;斯里兰卡国内的大型项目中中国援助建设所占的比例高达90%。根据2015年斯里兰卡中央银

行的报告,2013年斯里兰卡20亿美元的外资中40%来自中国,此后中国始终是斯里兰卡最大的投资来源国。⁴ 2016年,中国首次成为斯里兰卡最大贸易伙伴和进口来源国,双边贸易额达到45.6亿美元。截至2016年年底,中国企业对斯里兰卡累计直接投资近10亿美元。⁵ 中国企业在斯里兰卡累计签订工程承包合同额180亿美元,完成营业额127亿美元,⁶ 其中,已建成的汉班托塔港、科伦坡机场高速公路等项目在推进斯里兰卡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此外,中斯自贸区谈判自2014年9月正式启动以来,不断取得积极进展。密切的经济联系不仅使双方共享发展红利,也使中国成为斯里兰卡经济社会发展的坚定支持者和活跃参与者。

2005年,拉贾帕克萨总统提出斯里兰卡建设海事、航空、商业、能源和知识五大中心的“马欣达愿景”。⁷ 为推进中斯传统友谊和互利合作关系,2005年4月,温家宝总理在访问斯里兰卡期间,与斯里兰卡总统库马拉通加夫人一起,将中斯关系定位为真诚互助、世代友好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

- 1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载《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
- 2 《专访斯里兰卡驻华大使阿穆努加马》,载《当代世界》2008年第9期,第13页。
- 3 Malathi De Alwis, “The ‘China Factor’ in Post-war Sri Lanka,”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Vol.11, No.3, 2010, p.436.
- 4 陈晨:《斯里兰卡总统今起首访中国 回击西方唱衰两国声音》,载《环球时报》2015年3月25日。
- 5 《商务部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站,2017年2月16日,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ae/slfw/201702/20170202517107.shtml>.
- 6 《商务部:中国是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首要目标国》,财经网,2017年2月16日, <http://economy.caijing.com.cn/20170216/4235357.shtml>.
- 7 “Sri Lanka Seeks Constructive, Meaningful Economic Cooperation with its Allies-defence Secretary,” November 26, 2013, http://www.priu.gov.lk/news_update/Current_Affairs/ca201311/20131126slseeks_constructive_meaningful_economic_cooperation_with_allies.Html.

2009年，历经30年的斯里兰卡内战结束。结束内战后的斯里兰卡百废待兴，亟需全面经济建设。恰逢此时，2013年，习近平提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在中国公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¹中，明确规定“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点方向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而在这条线路上斯里兰卡正处于要冲之地，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从东南亚到中东地区的“中间站”。对于斯里兰卡来说，加强同中国的双边关系，恰好可以搭上中国发展的“顺风车”，推动斯里兰卡国内社会经济的发展。²正是因为如此，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斯里兰卡是首个以政府声明形式支持中方倡议的国家。2013年5月，斯里兰卡总统拉贾帕克萨来华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决定将中斯关系提升为真诚互助、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³“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五通”，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则成为中斯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目标和路径。

2014年9月，习近平主席出访斯里兰卡，并在斯里兰卡《每日新闻》



报发表题为《做同舟共济的逐梦伙伴》的署名文章，对中斯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内涵进行了阐释。⁴基于此，可以将中斯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内涵分为四个层次：

第一，两国要同舟共济，实现合作发展。为了追求国家发展，两国都提出了各自的国家发展战略：斯里兰卡提出“马欣达愿景”，要实现强国富民梦；中国提出“中国梦”，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两国共同的发展

愿景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这一合作框架和桥梁下完全能够得以实现。

第二，两国要互利共赢，实现共同发展。中国对周边国家一直非常重视，在外交布局中有着“周边是首要”的定位。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发展能够为斯里兰卡人民带来更多的“中国红利”，中国通过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建设能够持续为斯里兰卡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促进斯里兰卡产业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

第三，两国要加强战略协作，做相互支持的坚强后盾。斯里兰卡在涉及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给予中国以坚定的支持，中国也坚定支持斯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坚定支持斯里兰卡维护国家独立、主权、领土完整的努力，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以任何借口干涉斯里兰卡内政。因此，中国一直被认为“对于向有利于斯里兰卡政府方向终结泰米尔人叛乱的军事僵持状态起到了关键性作用”。⁵

第四，两国要推进双方交流和认知，巩固睦邻友好，做到世代友好。中国与斯里兰卡两国之间有着真挚的友谊，在中斯共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背景下，两国深厚的历史人文积淀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站，2015年4月1日，<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summary/n/201504/20150400929655.shtml>。

2 易先良：《“一带一路”为中斯合作带来新机遇》，载《中国投资》2017年第1期，第59—60页。

3 《习近平同斯里兰卡总统拉贾帕克萨会谈》，新华网，2013年5月28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05/28/c_115943561.htm。

4 《习近平在斯里兰卡媒体发表署名文章：做同舟共济的逐梦伙伴》，人民网，2014年9月17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4/0917/c1024-25674241.html>。

5 Jeremy Page, “Chinese Billions in Sri Lanka Fund Battle against Tamil Tigers,” *The Times*, May 2, 2009.

需要继续发掘，两国文化、教育、宗教等的交流合作需要不断扩大，从而推进双方之间的相互了解，实现文化交融、民心相通，巩固睦邻友好，做到世代友好。

在这次出访中，两国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斯里兰卡民主社会主义共和国关于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行动计划》，¹提出加强高层互访、启动两国自贸协定谈判、加强投资合作、深化中斯文化交流与合作等 17 条具体计划；对于中斯战略伙伴关系，两国首脑认为，“中斯真诚互助、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已成为两国各自外交政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两国元首的互访，尤其是习近平主席对斯里兰卡的访问，推动了中斯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向高层次阶段发展，同时也表明两国对彼此战略定位进一步提升，彼此之间的认可度不断增强，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从构建中斯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路径选择看，它一方面体现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中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把中国同沿线国家的发展结合起来，为世界提供共同繁荣发展的中国方案的战略构想；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习近平



外交思想中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扩大同各国的利益交汇点的战略布局。而元首外交则成为践行这一思想的重要方式。

二、影响因素

在中斯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建设中，两国的目标是“增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增进人民友好，促进共同发展”。²但随着亚太地区局势日趋复杂，加之斯里兰卡国内政治局势的变化，中斯关系受到内外部因素影响出现了一些曲折和困难，给中斯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建设带来了不容忽视的挑战。

2015 年 1 月，迈特里帕拉·西里塞纳大选获胜，成为斯里兰卡新任总统。³西里塞纳执政后，斯里兰卡外交政策发生重大转向，其核心就是降低对中国的依赖，转而加强与日印两国的关系。斯里兰卡新政府在成立之后彻底改变拉贾帕克萨政府对中国企业的优惠政策。⁴虽然中国被视为“唯一有资源、也有意向帮助斯里兰卡发展的国家”，⁵但西里塞纳总统态度的“微妙”变化使中斯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建设的既定“路线图”面临严峻的挑战。

探究斯里兰卡对华政策变化的原因，可以大致分为以下三方面：

（一）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主权国

-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斯里兰卡民主社会主义共和国关于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行动计划（全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2014 年 9 月 17 日，http://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zl_674979/ywzt_675099/2014zt_675101/xcf_675183/zxxx_675185/t1191913.shtml。
- 2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斯里兰卡民主社会主义共和国联合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2013 年 5 月 30 日，http://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1179_674909/t1045487.shtml。
- 3 “What Sri Lanka’s Presidential Election Means for Foreign Policy,” Carnegie, Jan. 16, 2015, http://carnegieendowment.org/2015/01/16/what-sri-lanka-s-presidential-election-means-for-foreign-policy/hzh0?mkt_tok=3RkMMJWwF9wsRoluK7KZKXo_njHpfsX66OUvXaCg38431UFwdejKpmjr1YACT8p0aPyQAgobGp5I5FEIQ7XYTLB2t60MWA%3D%3D。
- 4 Nizla Naizer, “China’s Road to Economic Success,” *The Bottom Line*, Aug. 30, 2009. http://www.cctb.net/llyj/lldt/qqzl/201405/t20140504_306601.htm。
- 5 《斯里兰卡前总统称应感谢中国投资》，新华网，2015 年 3 月 13 日，http://news.xinhuanet.com/cankao/2015-03/13/c_134064744.htm。

家，斯里兰卡国内存在诸多影响对外战略权衡与政策制定的因素。

1983年，斯里兰卡爆发国内战争，经济社会发展长期缓慢。进入21世纪后，斯里兰卡结束了内战，但经过30年内战，斯里兰卡百废待兴，亟需全面经济建设。拉贾帕克萨2005年当选总统后，提出了斯里兰卡建设海事、航空、商业、能源和知识五大中心的“马欣达愿景”，这与后来习近平提出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中的“五通”高度一致。这是中斯关系不断向好的根本原因。但是不可忽视的是，斯里兰卡国内因素仍是影响中斯关系的重要因素。

一是斯里兰卡的民主选举政治使其对外政策容易出现变数。斯里兰卡在结束内战后，国家走向发展的正轨，社会稳定程度逐渐提高并走向成熟。根据斯里兰卡国家宪法的规定，斯里兰卡实行总统制，总统为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武装部队总司令，享有任命总理和内阁其他成员的权力；总统由选民选举产生，每届任期五年，可连选连任。¹一方面，选举制使得领导人的更迭成为政治常态，由领导人决定的对外政策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另一方面，民主选举体制使得总统候选人必须要迎合选民的倾向来制定政

另外，斯里兰卡的多党制制度容易出现“为反对而反对”的情况或者吸引选民的激进政策出现，使得斯里兰卡对外政策的变数较多。

治宣言并予以实现，而选民的认知易被引导，当民意主动或被动发生变化时，通过选举获任的总统需要对此加以回应，这就使得包括对华政策在内的斯里兰卡外交政策存在变数。另外，斯里兰卡的多党制制度容易出现“为反对而反对”的情况或者吸引选民的激进政策出现，使得斯里兰卡对外政策的变数较多。例如，西里塞纳的胜选就被认为是斯里兰卡少数民族特别是泰米尔人和穆斯林为了反对拉贾帕克萨而投的一百万张选票所造成的。²

二是斯里兰卡的国家对外行为偏好与中国不同。在国际社会中，国家行为偏好是一个国家长期以来所表现出的行为规律，是内外政策共同影响的结果。这种行为偏好在同类型国家（国情、国力、发展阶段等）之间显现不出来，但在不同类型国家（发展诉求、战略诉求、国力等不同）之间通过比

较总结能够分析出来。美国外交政策研究专家迈克尔·曼德尔鲍姆在《国家的命运：19世纪和20世纪对国家安全的追求》一书中总结到的强国和弱国之间的交往规律，即：首先，弱国偏好“建设护城河”策略，在政治和经济上减轻自己因强国通过强化政治和经济关系拉近和弱国的距离而产生的脆弱性；其次，与强国的明显双边偏好不同的是，弱国喜欢多边主义机制，以便使其能在讨价还价中利用其他国家的支持。

再次，面对强国试图用权力迫使弱国服从自己意愿的情况，弱国会尽可能通过自身努力获得更大的军事实力，即所谓的“内部平衡”或通过其他大国的支持巩固自己的防御能力即“外部平衡”。³中国与斯里兰卡之间的关系就是典型的强国和弱国之间的关系：在斯里兰卡极力保证本国事务不受外部势力干涉的情况下，对中国依赖程度的加强会使得斯里兰卡对自己的独立性产生担忧，也会使得斯里兰卡遭到来自中国的竞争者施加的压力，使其成为大国角逐的战场。因此，斯里兰卡开始有意识地减弱同中国合作的领域广度，放缓《中斯关于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行动计划》⁴的落实工作，甚至在一些领域出现搁置的情

1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Democratic Socialist Republic of Sri Lanka*. <http://www.parliament.lk/files/pdf/constitution.pdf>.

2 “Why He Wants Rajapaksa Out: CM Says No Power, My Phones Tapped,” *The Indian Express*, January 8, 2015. <http://indianexpress.com/article/world/neighbours/why-he-wants-rajapaksa-out-cm-says-no-power-my-phones-tapped/>.

3 【美】迈克尔·曼德尔鲍姆：《国家的命运：19世纪和20世纪对国家安全的追求》（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50—194页。

4 《中斯关于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行动计划（全文）》，新华网，2014年9月17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09/17/c_1112507241.htm.

况, 极大地影响了中斯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发展。

(二) 从地缘因素考虑, 作为南亚地区的重要国家, 印度对斯里兰卡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近年来随着印度国力的提升和海洋战略的强化, 其在南亚地区乃至亚太地区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受到重视, 印度在南亚地区与斯里兰卡的关系更是呈现出微妙的态势。

一是印度和斯里兰卡两国之间具有悠久的交往历史和地缘联系。公元前5世纪前后, 僧伽罗人的祖先就经印度到达斯里兰卡; 大约在14世纪初, 来自南印度的泰米尔人在斯里兰卡北部建立了贾夫纳王国; 在殖民地时期, 来自印度的劳工成为斯里兰卡种植园的主力。密切的往来和交流历史使得同印度保持友好关系成为斯里兰卡外交政策的重点; 地缘上, 印度与斯里兰卡隔海相望, 距离最近的地方仅35公里,¹ 印度和斯里兰卡的交往具有比较便利的条件。

二是印度外交政策的重视。印度的外交政策中, 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关系始终是其外交政策的基石。在莫迪

近年来随着印度国力的提升和海洋战略的强化, 其在南亚地区乃至亚太地区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受到重视, 印度在南亚地区与斯里兰卡的关系更是呈现出微妙的态势。

担任总理后, 更是提出“邻国第一”² 的政策。在印度的外交设想中, “印度洋是印度政府制定政策时需要优先考虑的首要问题, 印度政府要竭尽全力保卫印度洋岛屿。”³ 印度希望通过印度洋区域国家合作, 建设印度主导的“印度洋海上防务链条”, 使其成为印度洋地区安全的提供者, 并向国际社会传递“南亚及印度洋事务由印度说了算”的信号。⁴ 斯里兰卡内战结束后, 印度对斯里兰卡外交政策迅速从“对外干涉”目标国调整为印度洋事务的合作国。印度力求以斯里兰卡的泰米尔人为纽带, 发展两国的文化交流; 在保持两国传统友好的基础上, 恢复并保持对斯里兰卡的传统政治影响,

避免斯里兰卡成为中国的盟友。随着印度“东向政策”的推行, 其向斯里兰卡投入了越来越多的精力, 冀图确保在斯里兰卡的安全和战略利益, 进而成为南亚霸权国。而中国则成为其假想敌。特别是近年来, 中斯两国开展了港口建设合作, 印度对此保持高度警惕。⁵

(三) 斯里兰卡在印度洋所具有的优越的地缘战略地位使其成为大国角力的交汇点。

虽然在斯里兰卡内战结束后, “中、印很快填补了西方撤出后的权力真空”,⁶ 但因其优越的地缘战略位置, 斯里兰卡一直是其他域外国家的重点关注目标和战略争取对象。

近年来, 人权问题已成为西方国家对斯里兰卡施加影响的重要手段。在治理国内分裂问题的过程中, 斯里兰卡一直反对外部势力以任何形式干预本国事务, 但在“猛虎”组织被消灭后, 外部势力对斯里兰卡国内事务的干预并没有停止, 西方国家还多次推动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通过涉斯决议, 对斯里兰卡国内事务进行干预。印度作为斯里兰卡邻国也期望“通过

1 朱明忠:《印度教在世界的传播与影响》,载《南亚研究》2000年第2期,第44页。

2 S. D. Muni, “A Disappointing SAARC Summit,” Al Jazeera, November 28, 2014. <http://www.aljazeera.com/indepth/opinion/2014/11/disappointing-saarc-summit-2014112885157300755.htm.l>

3 “India will Do All to Protect its Interest in Indian Ocean: Modi,” Net India, Mar 12, 2015. http://www.Netindia123.com/netindia/showdetails.asp?id=2552513&n_date=20150312&cat=World

4 蓝建学:《新时期印度外交与中印关系》,载《国际问题研究》2015年第3期,第53页。

5 B. Raman, “Chinese Inroads into Sri Lanka,” South Asia Analysis Group, Paper No.3759, Apr.13, 2010. <https://www.outlookindia.com/website/story/chinese-inroads-into-sri-lanka/265026>

6 Sergei DeSilva-Ranasinghe, “Sri Lanka: The New Great Game,” *Future Directions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Analysis Paper*, Mar.24, 2010, p.3.



在人权上与美、欧站队以便借力平衡中国在斯里兰卡的影响”。¹斯里兰卡在各方有关人权问题的强大压力下，不得不在一些战略合作事务上做出让步，以换取西方国家在人权问题上的缓和态度。例如，西里塞纳政府明确表示要“纠正上届政府在人权领域所犯的错误，加强与国际社会的合作，在政治、经济、社会、宗教信仰等各方面改善本国人权状况”。²在此情况下，与中国的紧密合作有可能被当作谈判的筹码，进而影响到中斯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建设进程。此外，当斯里兰卡外部环境改善时，对中国支持

的需求度也会降低，对中斯关系的定位也会发生改变。

由于斯里兰卡具有重要的地缘战略位置，一直受到大国的青睐，“这既源于南亚与东南亚、东北亚次区域板块之间的经济互动，也源于亚洲国家对中东石油的整体依赖。”³对在印度洋拥有绝对优势的海上力量的美国而言，虽然曾经“相对忽视了斯里兰卡这个小岛在美国媒体的报道中不再那样默默无闻”。⁴时至今日，美国依然是斯里兰卡主要援助国和最大的出

口市场。“为了削弱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巩固自身的势力范围，美国长期运用各种手段插手斯里兰卡国内事务，以期借机离间中国与斯里兰卡的友好合作关系”。⁵2015年5月，美国国务卿克里到访斯里兰卡，成为43年来首位访问斯里兰卡的美国国务卿。访问期间，克里肯定了斯里兰卡民主的进步和国内的政治改革及提供援助的方式，随后不久，美国国家开发署便向斯里兰卡提供了环保工业设备。⁶同时，斯里兰卡也是日本积极拉拢的对象。2015年6月，斯里兰卡外长萨马拉维拉访日，获得日本向斯里兰卡提供2亿多美元官方发展援助贷款的“见面礼”。⁷除此之外，英国等国家也对斯里兰卡缓和关系的举措给予积极回应。在此情况下，中斯关系的发展空间会受到其他国家的“挤压”，中斯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建设必然受到一定的挑战。

影响中斯关系的因素既有外部压力，也有内部动因，而克服这些消极因素的关键在于明确双方利益的交汇点，求同存异，使双方在一个共同的目标下合作共赢。

1 The Economic Intelligence Unite, Country Report: Sri Lanka, June 2013, p.4.

2 “Foreign Minister addresses High-level Segment of HRC in Geneva,”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Government of Sri Lanka. <http://www.mea.gov.lk/index.php/en/visits/outgoing-visits/5984-foreign-minister-addresses-high-level-segment-of-hrc-in-geneva>.

3 Gurpreet S. Khurana, “Security of Sea Lines: Prospects for India-Japan Cooperation,” *Strategic Analysis*, Vol.31, No.1, 2007, pp.139-153.

4 【美】罗伯特·D.卡普兰：《季风：印度洋与美国权力的未来》，吴兆礼、毛悦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46—247页。

5 “Foreign Minister Concludes Successful Visit to U. S.,” Monday, February 16, 2015. http://www.priu.gov.lk/news_update/Current_Affairs/ca201502/20150216foreign_minister_concludes_successful_visit_us.html.

6 “USAID Helps Ampara Manufacturer Develop Eco-friendly Roofing Products”. <http://srilanka.usembassy.gov/pr-27may15.html>.

7 “Foreign Minister Mangala Samaraweera Concludes Successful Visit to Japan,”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Government of Sri Lanka. <http://www.mea.gov.lk/index.php/en/media/media-releases/6125-fm-concludes-japanvisit>.

三、危机处理

对于斯里兰卡政权更迭给中斯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带来的挑战，习近平提出，要把合作共赢理念体现到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等对外合作的各个方面，以这一原则为指导，虽然2015年1月西里塞纳当选斯里兰卡总统前后，中斯关系迅速冷却，中斯关系在经历了西方国家所谓的“变冷”甚至停滞阶段后出现了暂时的波折和困难，但中斯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坚实基础并未随着斯里兰卡政权更迭而发生重大变动。经过短暂的波折后，斯里兰卡新政府开始重新审视两国关系现状，并通过实际举措修复两国关系，使其回到正确的道路上。而在这一过程中，习近平熟练运用元首外交，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一方面，西里塞纳当选总统后，习近平迅速致电祝贺，并提到“中方视斯里兰卡为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中方高度重视发展对斯关系，愿同斯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斯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¹释放了对斯里兰卡新政府的友好态度和从战略高度推进中斯伙伴关系深化发展的意愿。另一方面，2015年2月和10月，中国先后派出中联部部长王家瑞和外交部副部长刘振民作为政府特使前往斯



里兰卡就两国关系及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开展进一步面对面对话磋商，并得到斯方西里塞纳总统、维克勒马辛哈总理会见。正是通过首脑特使的沟通，双方表示“愿进一步加强高层接触，增进战略沟通，发挥领导人对双边关系发展的引领作用”，“双方愿以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为契机，更加紧密地对接各自发展战略，实现互利共赢。”²同年2月，中国外长王毅与来华访问的斯里兰卡外长萨马拉维拉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国愿作斯可以信任、可以依赖的发展伙伴，坚定支持斯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努力，愿向斯经济社会发展继续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萨马

拉维拉表示，“斯新政府殷切期待进一步提升斯中关系发展水平，深化同中国的全方位合作。”³中方对斯里兰卡政权更迭而产生的危机做了积极反应，这种高层互动直接促进了中斯关系的恢复。

当选总统半个月后，斯里兰卡总统西里塞纳于2015年1月26日冒雨视察了中国企业承建的摩拉加哈坎达和卡鲁干加水库项目，高度评价中国政府和企业在斯里兰卡水库项目做出的贡献，并表示将进一步推动斯中关系发展。水库项目作为斯里兰卡重要的民生工程，建成后“将为岛国蔬菜种植基地提供持续水源，并使千万斯里兰卡民众受益”，⁴解决斯里兰卡千万人的饮水问题和灌溉问题。

紧接着，2015年2月5日，斯里兰卡政府宣布，批准继续建设科伦坡港口城项目。科伦坡港口城项目此前是中斯关系的标志性项目，这个项目的暂停曾被外界视为评判中斯关系出现裂痕的依据。而这一项目的恢复则成为中斯关系回暖的象征。

在应对斯里兰卡政权更迭带来的中斯关系的急剧变化过程中，通畅的高层对话渠道是中斯关系回暖的有力保障，顶层设计为双方开展外交行动提供了便利条件，元首外交在双方获

1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里塞纳当选斯里兰卡总统》，新华网，2015年1月9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1/09/c_1113944316.htm。

2 《中国政府特使、外交部副部长刘振民举行媒体见面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2015年10月9日，http://www.fmprc.gov.cn/web/wjbxw_673019/t1304612.shtml。

3 《王毅与斯里兰卡外长萨马拉维拉举行会谈》，人民网，2015年2月27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5/0227/c70731-26608614.html>。

4 《斯里兰卡总统赞扬中国政府和企业所作贡献》，新华网，2015年1月28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5-01/28/c_1114163341.htm。

知对方国家最新政策立场、沟通双方当前优先事项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通过双方首脑的频繁互动，因为首脑变更产生的两国关系的重大变化，又在新的元首外交中得以修复，双方重新释放出交往的善意，从而促使斯里兰卡新政府重新审视两国关系现状，并通过实际举措修复两国关系，使双方关系重新回到正确的高水平发展的轨道上来。

事实上，在中斯交往中，元首外交始终是两国关系的“晴雨表”。高频次的首脑会晤往往是两国关系高水平运行的表现，也是两国关系保持健康发展态势的动力。2014年5月，斯里兰卡总统拉贾帕克萨来华出席亚信第四次峰会，并与习近平主席举行会晤；同年9月，习近平主席对斯里兰卡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国国家元首时隔28年再次访斯。近年来，中斯双方高层领导每年都有互访交流，元首外交极大程度地推动了中斯两国之间的良性政治互动和紧密的外交往来。

西里塞纳执政后，中斯两国间的首脑会晤呈现出高频次、多场合、全方位的特点，为两国关系从阶段性的波折与困难中走出并迅速回暖注入了强劲的动力。2015年3月，当选仅两个月的西里塞纳应习近平主席邀请开启了其上任后首次对华的国事访问并

事实上，在中斯交往中，元首外交始终是两国关系的“晴雨表”。高频次的首脑会晤往往是两国关系高水平运行的表现，也是两国关系保持健康发展态势的动力。

参加博鳌亚洲论坛年会。3月26日，习近平在会见西里塞纳时表示：“中斯友好是两国历代领导人及各界人士精心培育的结果，是两国人民共同拥有的宝贵财富，应该长期继承好、维护好、发展好”，“中国对斯合作是建立在互利共赢基础之上的，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中方始终将斯里兰卡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西里塞纳表示：“斯方希望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框架内加强同中方合作”，“希望同中方加强经贸、教育、科研、防务领域合作”。¹两国元首的这次会晤及达成的系列共识，标志着中斯两国关系在经历了短暂的波折后，重新走向了快速发展的良性局面，两国关系迈上了新的台阶。同年4月，斯里兰卡以创始会员国的身份正式确认加入亚投行。

2016年4月，习近平会见斯里兰卡总理维克勒马辛哈。习近平指出，“中

方愿同斯方一道，巩固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真诚互助、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中斯可以将双方发展战略更加紧密地对接起来，在发展中不断提升两国关系。双方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加强战略沟通，从长远和战略高度把握中斯关系发展方向，做好两国关系及各领域合作的顶层设计”。维克勒马辛哈感谢中国长期以来给予斯里兰卡的帮助和支持，并明确表示“愿积极参与中方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进一步加强在港口、机场等基础设施建设、贸易投资、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文化交流与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²

2017年2月7日，习近平同西里塞纳互致贺电庆祝中斯建交60周年。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推动中斯真诚互助、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焕发新的生机活力”。西里塞纳在贺电中表示，“相信‘一带一路’倡议将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基础上开辟斯中合作的新时代”。³

两国元首的首脑会晤机制不仅限于两国首脑互访，在多边外交的舞台上，两国元首多次举行双边会晤和会谈，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2016年10月，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八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会见西里

1 《习近平同斯里兰卡总统西里塞纳举行会谈》，新华网，2015年3月26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5-03/26/c_1114774711.htm。

2 《习近平会见斯里兰卡总理维克勒马辛哈》，新华网，2016年4月8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4/08/c_1118572317.htm。

3 《习近平同斯里兰卡总统西里塞纳互致贺电庆祝中斯建交60周年》，新华网，2017年2月7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7-02/07/c_1120426208.htm。

塞纳。习近平指出，“当前，中斯关系呈现积极健康发展势头。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将几代人精心培育的中斯友好传承下去并发扬光大。”西里塞纳表示，“斯中关系历史悠久，新形势下正发展得更加强劲”，“斯方愿加紧落实斯中有关经贸协定和大项目合作，欢迎中国企业加大对斯投资”。¹两国元首一致同意要共同办好2017年两国建交60周年庆祝活动，并以此为契机继续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和配合。

2017年1月，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上，斯里兰卡总理维克勒马辛哈向出席论坛的习近平主席表示，“科伦坡港口城项目已经全面复工，希望能够听取习主席关于‘一带一路’建设的新看法、新愿景”，这与维克勒马辛哈此前在斯里兰卡议会讲话中重申的“中方投资对斯里兰卡南部发展至关重要”的提法高度一致，体现出斯里兰卡希望中方能在斯里兰卡经济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实现双方各自优势的意愿。

首脑会晤促进中斯关系阶段性的“高峰时刻”出现的标志性事件则是前不久刚刚落下帷幕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这次论坛上，习近平在会见维克勒马辛哈时表示：“中国对斯里兰卡的友好政策是长

中斯关系的回暖证明了中斯双方完全可以通过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走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的国与国交往新路；中国对周边国家核心利益的关切，可以有效地加强双方关系的抗风险能力，夯实中斯关系的交往基础，使中斯关系没有因为斯里兰卡的政权更迭发生结构性变化。

期战略性选择”，“双方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加强对中斯关系发展的顶层设计和政策沟通”。维克勒马辛哈也表示：“斯方愿同中方共同努力，顺利推进汉班托塔港项目和科伦坡港口城项目。”2017年5月16日，在中斯两国总理见证下，两国政府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斯里兰卡民主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关于促进投资与经济合作框架协议》，²两国政府希望加强双方政府、企业和其他机构间的交流，推动中斯投资合作健康稳定发展，促进“一带一路”建设，保障在斯中国企业权益。

中斯关系的回暖证明了中斯双方

完全可以通过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走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的国与国交往新路；中国对周边国家核心利益的关切，可以有效地加强双方关系的抗风险能力，夯实中斯关系的交往基础，使中斯关系没有因为斯里兰卡的政权更迭发生结构性变化。

中斯关系的发展是两国几代领导人共同努力的结果。在中斯关系发展的60余年历程中，尽管两国国家制度不同、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恪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尊重彼此的国家利益。虽然在斯里兰卡新政府上台后，两国关系一度被新政府当作平衡大国关系的筹码，出现了短暂的波折，但中斯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无论谁当选总统，斯里兰卡与中国的经济联系都不会受到重大影响”。³

中国对中斯关系的危机处理，体现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中的“亲诚惠容”理念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思想；体现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中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遵循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扩大同各国的利益交汇点的战略思想；体现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的宏大构想，成为中国发展全球伙伴关系的成功案例。

1 《习近平会见斯里兰卡总统西里塞纳》，人民网，2016年10月17日，<http://cpc.people.com.cn/n1/2016/1017/c64094-28782972.html>。

2 中斯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斯里兰卡民主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关于促进投资与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站，2017年5月16日，<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ae/ai/201705/20170502576250.shtml>。

3 Kadira Pethiyagoda, “India vs. China in Sri Lanka: Lessons for Rising Powers,” May 1, 2015. <http://www.brookings.edu/blogs/order-from-chaos/posts/2015/05/01-china-india-sri-lanka-pethiyagoda>。



韩国学生汉语心理词典构成及影响因素¹

吴思娜 /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摘要

通过词汇联想测验,本文考察了不同学习阶段的韩国学生汉语心理词典的组织结构和影响因素。结果发现:(1)韩国学生汉语心理词典中组合反应和聚合反应比例最高,明显高于语音和其他反应,组合反应又明显高于聚合反应;(2)双字词的词性影响韩国学生汉语心理词典的组织结构。名词比动词引发了更多的聚合反应,这种模式只表现在前两个学习阶段(“一年以内”和“一年一两年”),动词并没有比名词引发更多的组合反应;(3)双字词的构词方式也影响韩国学生汉语心理词典的组织结构。偏正式名词比联合式名词诱发了更多的聚合反应,但这种影响也只存在于前两个阶段,两类名词的组合反应没有差异。本文对研究结果进行了分析和讨论,并对对韩汉语词汇教学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

韩国学生 词汇联想 二语心理词典 词性 构词方式

1 本文为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科研资助项目“19世纪西方人对汉语语音的认识与习得”的研究成果。

一、前言

心理词典,又称为心理词库或心理词汇,是指词汇知识存贮的心理表征。19世纪对失语症的研究开启了学界对心理词典的关注,之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研究心理词典的表征模式、词语提取等(周谨平,2013)。目前心理词典已经成为心理语言学中非常重要的研究领域,受到了众多语言研究者的关注。大部分心理词典的研究采用“词汇联想测试”方法,最常见的有看写法、听说法、听写法等,即给被试口头或书面呈现一个刺激词,让被试说出或写出联想到的词,也就是反应词。通过考察反应词与刺激词之间的关系,研究者可以了解被试心理词典的组织结构及表征方式。以往研究显示,被试的反应词与刺激词之间的关系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张淑静,2003;Nissen & Henriksen, 2006; 谢迷,2009;Li & Sun, 2009;付玉萍等,2009):

(1) 聚合反应:反应词与刺激词有明显语义关系,并且词性相同,如:比赛—竞争。

(2) 组合反应:反应词与刺激词能在句中构成顺序关系或搭配关系,如:比赛—足球。

(3) 语音反应:反应词与刺激词在发音上接近,但没有语义联系。如比赛—笔记。

(4) 无关反应:无上述关联的反应词,如比赛—邮票。

(5) 无反应:没有给出任何反应词。

心理词典,又称为心理词库或心理词汇,是指词汇知识存贮的心理表征。19世纪对失语症的研究开启了学界对心理词典的关注,之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研究心理词典的表征模式、词语提取等。

国内英语作为二语的研究发现:在初级阶段,中国英语学习者产生大量的语音反应(张淑静,2003、2005、2008;付玉萍等,2009),但也有证据表明语音反应即便在初级阶段所占比例也很小,聚合反应和组合反应占绝对优势(崔艳嫣,刘振前,2010)。虽是如此,大部分研究者还是认为语音联系在二语心理词典中起主导作用(张淑静,2005;谢迷,2009;付玉萍等,2009)。研究者还发现,随着二语水平的提高,学习者会产生更多的聚合反应,而非组合反应(张淑静,2003、2005;谢迷,2009;张萍,2010)。但同时,也有人提出水平较高的学习者会产生更多的组合反应,而非聚合反应(Li & Sun, 2009)。

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心理词典的组织结构远没有想象得那么简单。其结构不仅受学习水平制约,也与词汇本身的性质有关。研

究者先后发现了心理词典中的词频效应(Soderman, 1993)、词汇熟悉度效应(Namei, 2004)和词性效应(Nissen & Henriksen, 2006;张珊珊,2006)。然而这些都是针对英语进行的研究。汉语心理词典方面的研究目前相当有限。龚社莲(2010)考察了初级阶段越南学生汉语心理词典的组织结构,发现被试的组合反应高于聚合反应,但其他国家学生以及其他水平学生的情况目前不得而知。

众所周知,韩国不仅是汉语学习人数最多的国家,韩语中也存在大量的汉字词。汉字词的意义和用法有些和汉语词汇非常接近,如“和睦—화목”;但有些却和汉语差别很大,如“小心—조심”。韩语中的意思是“胆子小、不大方”。两种语言文字之间的共性和特性会对韩国学生汉语心理词典的组织结构产生何种影响呢?总结韩国学生汉语心理词典的组织结构特点及影响因素,将有助于教育者了解为数众多的韩国学生汉语词汇学习的特点,继而提供及时、有效的教学指导。

鉴于此,本研究拟探讨韩国学生汉语心理词典的组织结构,并将深入词汇内部,考察词汇特性对心理词典结构的影响。具体回答以下几个问题:第一,韩国学生汉语心理词典的组织结构如何?第二,双字词的词性是否影响韩国学生汉语心理词典的组织结构?第三,双字词的构词形式是否影响韩国学生汉语心理词典的组织结构?

二、研究内容

(一) 研究对象

韩国某大学汉语专业学生 43 名。其中汉语学习时间为一年以下者 13 名；一年至两年者 9 名；两年以上者 21 名。女生 30 名；男生 13 名。

(二) 研究材料

测试材料一共为 40 个双字词，选自韩国学生所用的汉语课本《新实用汉语课本》(1、2 册)，并且为《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中的甲级词。经班上未参加正式测试的同学和任课老师评定，全部为所学词语。具体种类、数量及分配见表 1。之所以选择名词和动词，原因有二：一是这两类词心理词典的组织结构在英语的研究中被发现有较大差异；二是这两类词学生接触最多、数量最大。构词方式以及构词数大小的选择也是基于学生最常使用词汇的种类和数量考虑。

(三) 反应分类及计分

本研究采用“自由联想测试”，即书面呈现一个刺激词，被试看到这个词后，在 20 秒之内将头脑中出现的第一个词写出来，不会写的汉字可以用拼音代替。如写出一个以上的词语，按照第一个反应进行分析。本文参考以往研究（邢红兵，2003；张淑静，2003；Namei，2004；Nissen & Henriksen，2006；谢谜，2009；付玉萍等，2009），将反应词分为五类：聚合反应（比赛—竞争）、组合反应（比赛—足球）、语音反应（比赛—笔记）、无关反应（比赛—邮票）、无反应五种

表 1：实验材料列表

测试词 (40 个)	动词 (16 个)	结婚、起床、比赛、上课、参加、练习、考试、游泳、帮忙、提高、放假、散步、认识、开门、见面、看病		
	名词 (24 个)	联合式 (8 个)	朋友、衣服、语言、生活、种类、身体、世界、时间	
		偏正式 (16 个)	构词数大(8 个)	汉语、机票、书店、画家、电影、商场、篮球、汽车
			构词数小(8 个)	饭馆、书包、牛奶、京剧、队员、医院、新年、花园

表 2：不同级别学生各类反应比例

反应类型	全体	一年以内	一年—两年	两年以上
语音反应	3%	4%	2%	2%
聚合反应	30%	36%	30%	24%
组合反应	61%	50%	62%	71%
无关反应	5%	7%	6%	2%
无反应	1%	3%	0%	1%

类别。这五种类别几乎包含了母语和二语者的全部反应类型，是当前研究者比较认可和广泛使用的分类模式。

评分由两位具有海外汉语教学经验的志愿者教师对所有反应词独立进行分类，事后统计二人评分一致性信度为 0.92。对于两位评定者分类不一致的反应词，由另外一位教师再次进行分类。最后，统计每种反应的频次和比例，数据分析使用 SPSS 19.0 统计软件进行。

三、研究结果

(一) 总体反应类型及差异

本研究共获得 1720 个数据。其中语音反应 49 次；聚合反应 503 次；组合反应 1089 次；无关反应 24 次；无反应 55 次。为了便于观察，将数据转换成百分数进行比较（见表 2）。对不同阶段学生各种反应进行 X² 检验发现，学生五种反应的差异显著（X² = 2416，df = 4，P < 0.001），聚合和组合反应的比例最大，分别占 30%

和61%，远高于语音反应和其他反应类型。组合反应高于聚合反应 ($X^2 = 215.7, df = 1, P < 0.001$)，三个阶段上聚合反应和组合反应的差异都显著 ($X^2 = 11.57, df = 1, P < 0.01$; $X^2 = 39.24, df = 1, P < 0.001$; $X^2 = 197.28, df = 1, P < 0.001$)。聚合反应随着学习时间的增加逐渐减少，而组合反应则逐渐增加，二者差异不断扩大 (见图1)。因为语音和其他反应类型所占比例较低，下文中将不做分析。

(二) 不同词性的双字词反应类型及差异

为了探讨双字词词性与反应类型的关系，接下来对名词和动词在两类反应上的差异进行分析。名词的确比动词引发了更多的聚合反应 ($X^2 = 23.58, df = 1, P < 0.001$)，但是动词并没有比名词引发更多的组合反应 ($X^2 = 2.61, df = 1, P > 0.05$)。

具体分析不同学习阶段的反应模式，结果见图2。聚合反应上，在前两个阶段(“一年以内”和“一年—两年”)，名词都比动词引发了更多的聚合反应 ($X^2 = 11.43, df = 1, P < 0.001$; $X^2 = 7.02, df = 1, P < 0.01$)，在第三个阶段(“两年以上”)名词和动词引发的聚合反应没有差异 ($X^2 = 0.31, df = 1, P > 0.05$)；组合反应上，三个阶段中名词和动词均没有差异 ($X^2 = 2.09, df = 1, P > 0.05$; $X^2 = 2.66, df = 1, P > 0.05$; $X^2 = 0.54, df = 1, P > 0.05$)。这说明，汉语词性会影响韩国学生汉语心理词典的反应类型，并

图1



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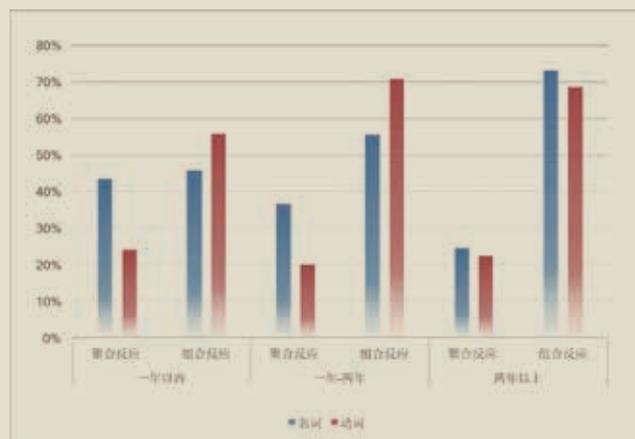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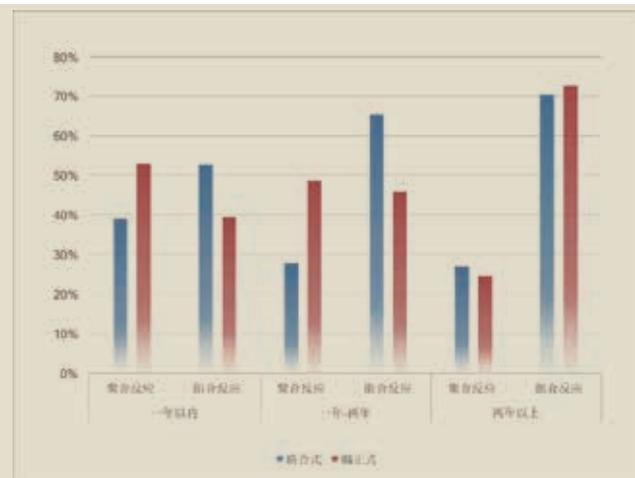


图3



且对不同阶段学生的影响方式不同。

(三) 不同构词方式的双字词反应类型及差异

有研究显示, 联合式与偏正式两种不同构成方式的合成词, 词素的激活方式不同(冯丽萍, 2001), 但以往研究是用反应时方法进行的。本研究将基于联想反应理论, 探索构词方式对心理词典的反应模式有何影响。结果发现, 联合式和偏正式名词聚合反应差异边缘显著($X^2 = 3.35$, $df = 1$, $P = 0.06$), 偏正式比联合式产生了更多的聚合反应; 但偏正式和联合式的组合反应没有明显差异($X^2 = 0.97$, $df = 1$, $P > 0.05$)。

具体分析不同学习阶段的反应模式, 结果见图3。与不同词性的反应模式一致, 在前两个阶段(“一年以内”和“一年一两年”), 偏正式比联合式产生了更多的聚合反应($X^2 = 3.11$, $df = 1$, $P = 0.07$; $X^2 = 4.09$, $df = 1$, $P < 0.05$), 在第三个阶段(“两年以上”)没有表现出差异($X^2 = 0.19$, $df = 1$, $P > 0.05$)。同样, 每个阶段上, 联合式与偏正式的组合反应均没有差异($X^2 = 1.09$, $df = 1$, $P > 0.05$; $X^2 = 2.45$, $df = 1$, $P > 0.05$; $X^2 = 0.07$, $df = 1$, $P > 0.05$)。这说明, 词汇结构对韩国学生汉语心理词典的组织结构具有一定影响, 但不同反应类型在各阶段的影响不同。

四、分析与讨论

(一) 韩国学生汉语心理词典的特征

本研究发现: 组合反应在韩国学生汉语心理词典中占绝对优势, 且本研究中每一阶段的学生均如此, 这与龚社莲(2010)对越南学生的研究结果一致, 但该研究只考察了初级阶段的学生。

本研究发现: 组合反应在韩国学生汉语心理词典中占绝对优势, 且本研究中每一阶段的学生均如此, 这与龚社莲(2010)对越南学生的研究结果一致, 但该研究只考察了初级阶段的学生。此外, 和英语二语者, 尤其是初级阶段二语者的心理词典以语音反应为主, 然后逐渐过渡到以聚合反应为主的模式相比(张淑静, 2005; 谢迷, 2009), 韩国学生即便在汉语学习的初级阶段, 语音反应的比例也很低(4%)。之所以出现此差异, 笔者分析可能与汉语语言特点有关。英语是一种拼音文字(Alphabetic Script), 具有形、音对应特点, 学习者若掌握音素的读音就能将生词拼读出来, 因此语音意识一直是探测英语母语儿童阅读能力的最有效的指标。中国的英语学习者在词汇量尚未充分发展、联想受限的条件下, 就会寻求语音线索进行联想, 因此语音反应也会增多, 相关研究也验证了这一点(张淑静,

2005)。而汉语是典型的表意文字, 缺少明显的形音对应规则, 无法通过字形推知字音, 使语音线索的有效性降低, 因此语音在汉语阅读中的作用不及英语, 这在儿童阅读的研究中也得到证实(McBride-Chang, 2005; 李虹等, 2011)。不仅韩国和越南的汉语学习者, 即便是汉语母语者, 其语音反应较英语母语者也低得多(张淑静, 2005; 谢迷, 2009), Namei(2004), 用实验证明的语音反应不分语言都具有重要作用的结论, 也都是基于拼音文字的研究。这说明, 语言特性可能会影响心理词典的组织结构。

有研究表明, 心理词典随着学习的深入在组织结构上会产生变化(Wolter, 2001; Li & Sun, 2009; 崔艳嫣, 刘振前, 2010)。英语的研究目前尚未达成共识, 由组合反应逐渐过渡到聚合反应占优的研究抑或反之都具有相当比例(Wolter, 2001; Namei, 2004; 张萍, 2010)。本研究显示, 韩国学生汉语心理词典也会随学习时间的变化而变化, 表现为聚合反应随着学习时间的增加逐渐减少, 而组合反应逐渐增加, 二者差异不断扩大, 韩国学生汉语心理词典的变化不仅表现在组合反应数量的增加, 组合反应的抽象性也随之提高。如对“比赛”的反应, “一年以内”学生的反应基本都是“足球”, 到了“两年以上”, 学生的反应词范围更广, 深度更深, 抽象性更强, 开始出现“竞争”、“精彩”、“热烈”、“现场”、“体育”、“项目”

等词语；再如对“语言”的反应，“一年以内”学生常常是“说”、“外国”、“学院”等词，而“两年以上”学生则出现了“网络”、“文化”、“习得”、“沟通”、“国际”等比较抽象的词。这说明，随着学习的深入，韩国学生汉语心理词典中句法联系不仅范围更广，且深度也在加深。

（二）词性对韩国学生汉语心理词典组织结构的影响

以往研究发现，刺激词的词性会影响反应类型（Deese, 1965: 43；张珊珊, 2006；张萍, 2011），名词更依赖聚合反应，而动词更易引发组合反应（Fillbaum & Jones, 1965；张珊珊, 2006），但也有研究得到了相反的结果（张萍, 2010、2011）。龚社莲（2010）对初级阶段越南学生汉语心理词典的组织结构的研究发现，不论名词还是动词，被试的组合反应均大于聚合反应，词性对反应类型没有明显影响。从本研究结果来看，词性对韩国学生的反应类型有明显影响：名词比动词引发了更多的聚合反应，但是动词并没有比名词引发更多的组合反应。随着时间的增加，词性效应逐渐消失。

对于名词为何会引发更多的聚合反应，Aitchison（2003: 108）曾分析，名词是大脑中最稳固的词类，对二语学习者来说，名词的语义知识比其他词类更容易获取和习得。由于名词在语言中主要是按层级分布的，如上下文关系、部分整体关系等（Nissen

以往研究发现，刺激词的词性会影响反应类型，名词更依赖聚合反应，而动词更易引发组合反应，但也有研究得到了相反的结果。

& Henriksen, 2006），因此名词引发聚合反应词的可能性比动词和形容词要大。在二语学习的初级阶段，韩国学生的心理词典还没有充分发展，词汇量有限，名词的这些特点易于学生产生语义上的联结，于是产生了更多的聚合反应。但是这种优势只存在于初级阶段，因为随着学习的深入，学习者的二语心理词典不断丰富，联结的节点数增加，语义联系的范围扩大，二语心理词典逐渐建立起自己的句法和搭配体系，对名词语义知识的依赖性降低，造成名词、动词之间的聚合反应没有差异。

双字词词性对韩国学生的组合反应没有影响，也就是说名词和动词引发的组合反应没有差异。这与以往研究发现的动词比名词诱发更多组合反应的研究结果不同（Deese, 1965: 56；张珊珊, 2006；龚社莲, 2010）。这可能与韩国学生常常将韩语词的用法迁移至汉语有关，比如对“认识”一词，不少韩国学生反应为“知识”。在汉语中我们不会说“认识知识”，“认

识”一般搭配人或者物等具象名词，“知识”一般与“学习”搭配。有17个韩国学生对“알다（认识）”的反应都是“지식（知识）”。这不是个别现象，可能是因为韩语里的“알다（认识）”一词，不仅仅有“认识”的意思，还有“知道、理解、明白”等意思，可以与“지식（知识）”搭配，所以学生看到“认识”时会写出反应词“知识”。动词的这种错误搭配降低了韩国学生组合反应的比例。此外，因为本研究所选择的词语相对简单，都是学生课本中学过的。学生已经形成了较为固定的语块，因此易形成组合反应。比如“生活”一词，学生产生频率较高的是“中国”、“日常”和“习惯”等词；而“比赛”一词，几乎全部的初级阶段学生（一年以下）都产生了“足球”一词，这样的反应在后两阶段学生中也占有一定的比例。由此可见，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形成的语块促使名词组合反应的比例增加，并与动词的组合反应差异不显著。

（三）构词方式对韩国学生心理词典组织结构的影响

以往关于心理词典的研究很少涉及到词汇本身的结构特点。词汇的认知研究表明，中级水平的外国学生已经具有中文合成词的结构意识（冯丽萍, 2001；邢红兵, 2003），学生对联合式与偏正式两种不同的合成词，语素的激活方式不同（冯丽萍, 2003；张金桥、吴晓明, 2005）。本研究具体考察了韩国学生对于不同结构名词的心理词典组织方式。结果发



五、教学启示

本文对对韩汉语词汇教学至少有以下几点启示：(1) 加强韩国学生词汇的联想学习。研究发现，韩国学生汉语心理词典的聚合反应数量不足，这与母语者的心理词典结构有较大差异 (Wolter, 2001; 张淑静, 2005; 张珊珊, 2006; 张萍, 2010)，因此要特别加强同义词、近义词和反义词的学习，丰富韩国学生汉语心理词典的语义联系。(2) 重视语块教学。虽然韩国学生汉语心理词典中组合反应的比例很高，甚至超过聚合反应的比例，而且随着学习的深入有不断扩大的趋势，但是实际上，学生的组合反应缺少多样性，产生的反应相对单一。在词汇教学中，教师要注意并善于利用语块，帮助韩国学生形成多种不同的语块，增加学生语块数量，扩大学生语块使用范围。(3) 注重语素教学，尤其是联合名词的语素教学。初级阶段语素意识的培养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 (冯丽萍, 2003)。关于语素教学的意义和方法，不少研究都进行过阐述 (冯丽萍, 2003、2009; 冯丽萍、宋志明, 2004)。本文要强调的是要加强韩国学生联合名词的语素教学。从研究中可以看到，联合名词的语素不易被学生分解，学生往往处于整体识记的状态，因此教师要特别注意引导学生发现联合名词中各语素的含义与作用，培养学生语素分解和组合的能力，最大限度提高词汇教学效率。

现，构词方式影响韩国学生的聚合反应，偏正式名词比联合式名词诱发了更多的聚合反应，但这种影响只存在于学习的前两个阶段（“一年以内”和“一年一两年”）。两类名词的组合反应没有差异。笔者分析，这可能与不同类型词语的表征方式有关。联合式和偏正式词语语素的激活模式不同 (冯丽萍, 2003)，偏正式词语的语素可能较早开始独立表征，而联合式的词语仍是整体表征。学生可以通过独立表征的语素联想到其他同语素词，而同语素词在初级或中级阶段的大部分词语中都有语义关联，从而引发更多的聚合反应。比如对“机票”一词的反应，56% 的学生用其中一个语素组词，产生了像“飞机”、“机场”、“火车票”、“门票”这样的反应；“晚饭”一词有47% 的学生用其中一个语素组词，“教师”一词有37% 的学生。在联合名词中，包含共同语素的聚合反应占全部聚合

反应的44%，而在偏正名词中，比例则高达86%。

偏正式名词比联合式名词诱发更多聚合反应的另一可能的原因是学习者学习过更多以偏正名词中的语素组成的词，比如说对于“机票”一词，学习者可能掌握了以“票”或“机”为语素的多个偏正名词，像“飞机”、“跑步机”、“游戏机”、“电影票”、“门票”、“火车票”等，因此比较容易产出同语素的词。如果是这样，偏正式名词的构词数应该会影响学生的反应，构词数大的词会产生更多的聚合反应。

接下来，笔者分析了偏正名词构词数对反应的影响。发现无论在聚合还是组合反应上，构词数大小对反应均无影响 ($X^2 = 3.1, df = 1, P > 0.05$; $X^2 = 1.62, df = 1, P > 0.05$)。这样的结果说明，学生对偏正名词更多的聚合反应是因为偏正名词中语素的独立表征，而非语素的构词能力。

《日本“中国文学研究会”研究》



著作名称：《日本“中国文学研究会”研究》
作者：熊文莉（北京外国语大学日语系）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7年11月

日本“中国文学研究会”是一个以反对日本传统汉学和中国学（二战前被称作“支那学”）为目标的社团，在20世纪日本中国研究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由竹内好和武田泰淳等人创立。本书以中国文学研究会出版的会刊《中国文学》为线索，将中国文学研究会置于日本的

汉学制度、学术制度、政治意识形态、出版制度和对外扩张等具体语境中进行全方位的分析和研究，通过梳理大量的基础资料，从发展史的维度去探讨其在日本中国研究中的历史地位，力求呈现中国文学研究会的全貌。

本书共分为六个部分。第一章为中国文学研究会成立之前的日本中国研究。为了凸显中国文学研究会成立的历史意义，就有必要回到“竹内好们”所处的那个时代，对那个时代的日本中国研究进行一番全面的梳理，这是进入中国文学研究会这一主题之前必须做的准备工作。在这一章中作者将从1930年代的日本传统汉学、日本战前的中国学以及中国研究三个方面全方位勾画中国文学研究会成立之前的日本中国研究概况。第二章为中国文学研究会的成立。在这一章中将重点讨论竹内好的第一次北京留学以及中国研究会成立初期的一些具体活动。在这一章中还将重点分析中国文学研究会的“中国”究竟意味着什么，对这一问题的把握将成为理解研究会精神的一把钥匙。第三章将讨论中国文学研究会的会刊《中国文学》。在这一章中将通过细读《中国文学》这份连续出版8年的同人杂志，分析和研究对于中国文学研究会来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意义何在，以及虽然名为《中国文学》，但是《中国文学》究竟是一份什么性质的杂志，它只是在讨论中国现代文学的问题吗？在回答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中国文学研究会的翻译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第

四章将谈论中国文学研究会和战争的问题。由于中国文学研究会诞生在一个极其特殊的历史时期，在讨论中国文学研究会时势必会面对日本侵华战争这一不可回避的历史问题，特别是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日本的侵略战争进一步升级，在日本国内12月8日成为一个历史的转折点，此时，竹内好发表了《大东亚战争和吾等之宣言》。这一文本现在被视为竹内好的“污点”，但是该文发表时并没有署名，而是作为中国文学研究会这个团体的言论刊登在了《中国文学》的卷首，因而本书将在中国文学研究会这一框架内讨论这一文本，而并不仅仅将其归结为竹内好个人的问题。在整个日本侵华战争期间，中国文学研究会的同人中有被征召入伍者，也有进入日本的外围国策组织工作的人，但是可以肯定地说，作为一个社团，中国文学研究会始终与当时的日本国家机器和国策保持着距离，这一点在研究会对待当时召开的所谓“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的态度上表现得极为明确，这也将是本章所要论述的重点之一。第五章要谈论的是中国文学研究会的解散。中国文学研究会于1943年1月宣告解散，与此同时《〈中国文学〉的废刊与我》分析了竹内好为何要坚持自己的主张，以及与其他同人之间的分歧在哪里等问题。虽然中国文学研究会解散了，但是留下了丰富的遗产，除了会刊《中国文学》以外，作为中国文学研究会时代的结晶，竹内好和武田泰淳分别出版了《鲁迅》和《司马迁——史记的世界》两部名著。在这一章中将从研究会的“遗产”这一视点对两部著作进行解读。

虽然中国文学研究会在日本战败以前就已宣告解散，此后再也没有恢复重建。然而即使是失去了研究会这一有形的组织形式，在日

本战败投降以后旧同人们却在实质上依然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始终进行着松散的活动，而这样一种松散的活动一直持续到1953年，也是在这一年中国文学研究会才真正结束了其历史使命。因而在第六章中将以战败后的中国文学研究会为题对解散后的中国文学研究会进行考察。在这一考察中，《复刊〈中国文学〉》将成为一个重点。围绕着《复刊〈中国文学〉》问题，竹内好再一次和其他同人形成了对立，在他看来，《中国文学》事关中国文学研究会的传统，竹内好不能容忍在没有对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进行充分反省的情况下就恢复出版《中国文学》这一行为，因此他自始至终都不承认《复刊〈中国文学〉》的地位。但是如果回避《复刊〈中国文学〉》的问题将直接导致中国文学研究会历史的不完整，因而有必要对《复刊〈中国文学〉》进行讨论。而对于战后的中国文学研究会来说，除了他们的中国文学研究外，最大的成果是已经变身为战后派文学代表作家的武田泰淳的长篇巨著《风媒花》的出版。《风媒花》这部小说几乎涵盖了近代中日之间所有的敏感问题，但那些问题不在本书论述的范围之内，本书将紧扣中国文学研究会这一主题来解读《风媒花》。虽然《风媒花》是一部小说，小说一般呈现的是虚构的世界，但是对于武田泰淳来说，《风媒花》是他对逝去青春的纪念，也是对他和同伴们一起走过的岁月的纪念，因此在《风媒花》中，他将虚构故事放置在中国文学研究会这一真实团体的世界中展开。笔者也将通过对《风媒花》所展现的中国文学研究会风貌进行解读，从而为本书对中国文学研究会历史的考察画上一个句号。



亚洲研究动态
Asia Research Network

主编 郭婍庆 赵宗锋

编辑 王惠英

设计 大达期刊设计公司

E-mail: icwar@bfsu.edu.cn

电话: 86-10-88813845

传真: 86-10-88816556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 19 号

北京外国语大学西院综合教学楼 1041 室

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 100089